昆明学院学报　2016, 38(5):70~76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历史】

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探析

吴　鹏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纳粹分子"发动反犹运动"后,欧洲犹太人民纷纷逃离故地,走向未知的土地。上海成为了当时许多犹太人民的理想去处之一。鉴于上海容纳人数的限制,国民政府计划在西南边区建立一个犹太难民寄居区,即"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这项计划曾给当时的犹太人民带来了希望,但迫于当时中国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这项计划最终搁置了。

关键词:云南;西南地区;国民政府;犹太难民;安置计划;反犹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5-0070-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5.014

A Study on the Resettlement Plan for the Jewish Refugees in Yunnan Province

WU P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In 1930s, the Nazi Germany launched the anti-Semitism movement, which made thousands of European Jewish people escaped to the unknown promised places. Shanghai was one of their destinations. Facing the fact of limited accommodation, national government made a plan to create a ghetto for Jewish people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 of China, and that was the Yunnan Jewish Refugees Resettlement Plan. This plan brought hope for the Jewish people; however, due to the contemporary harsh situ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lan was postponed finally.

Key words: Yunnan; the southwest area; national government; Jewish refugees; resettlement plan; anti-Semitism movement

犹太民族是一支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同时也是一支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民族。在欧洲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排犹事件。德国纳粹分子掌权后,加剧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驱逐,一批批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在世界各地寻求立足之地。上海就是当时犹太难民心中的"应许之乡"(Promised Land)之一。鉴于上海容纳犹太难民的人数有限,而难民不断地涌入的现实压力,国民政府决定在中国西南边区①划定一个犹太难民寄居区。由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制约,这项计划最终被搁置了,所以世人对这一计划的详情所知甚少,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更是罕见,②但它的意义不能就此被历史所湮没。

下面,本文就对这项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提出和被搁置的原因进行一番探析。

一、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由来

(一)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与驱逐

欧洲历史上早有排斥犹太人的事件,其中在近

收稿日期:2016-06-30
作者简介:吴鹏(1990—),男(侗族),湖南通道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①国民政府高层会议最后拟订将今云南腾冲和蒙自之间的地段划为犹太难民的寄居区,因此本文称该项难民安置计划为"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

②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只有一篇文章对该项计划背后中国和日本展开的斗争进行了介绍。其他的文章只是对相关的一些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发表,尚未看到有较为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例如,曹晓飞:《云南:犹太难民的希望之乡》,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一)》,民国档案,1999 年第 4 期;房建昌:《近现代外国驻滇领事馆始末及其他》,思想战线,2003 年第 1 期。

代尤为明显。1933 年德国纳粹分子掌握政权后不久,就掀起了“反犹运动”的热潮。随着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加重,一些犹太人感到自己即将大难临头,所以打算远赴他乡。

1938 年 11 月 9 日“水晶之夜”中,有 276 个犹太教会堂被夷为平地,超过 7 500 家企业被破坏,91 个犹太人被杀害,[1]犹太人的私有财产被“合法化”充公。这次事件打碎的不仅仅是玻璃块,还有犹太人的安全感。1938 年 3 月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也实行了“反犹运动”。于是,数以万计的德、奥犹太人纷纷逃往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然而,一些国家因为怕得罪法西斯国家而不敢接收犹太难民,还有的由于经济危机的压力而将犹太难民拒之门外。例如,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中,工业产值降低了 23.8%,出口额减少了 66.4%,进口额减少了 62.2%,经济大约倒退到 1897 年的水平,失业人数占到工人总数的 22.2%;当时的法国经济也降低了 32.9%,大约倒退到 1911 年的水平,失业人数占工人总数的 1/2。[2]在这样的困境下,他们自然不愿意成批的犹太难民涌入本国,给本国社会增加额外的压力。1938 年 7 月 6 日,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澳大利亚、阿根廷、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哥斯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新西兰、委内瑞拉、瑞士、瑞典、巴拉圭、巴拿马、乌拉圭、墨西哥、尼加拉瓜、挪威、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爱尔兰、厄瓜多尔和秘鲁 32 个国家,在法国埃维昂召开了国际难民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表示,难以继续接收数量庞大的犹太难民,因而将采取限制犹太人入境的措施,其结果,是更多的国家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国门。

中国历史上也有犹太人居住和生活在中国的痕迹。我们不但没有见到中国人反犹太人的事件,而且还看到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友好相处的一面,犹太民族渐渐地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这体现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以及犹太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和接纳。这样的历史文化渊源,证明犹太人来到中国是可以适应的、有安全感的。

到了近代,当犹太人遭到纳粹分子的迫害时,中国人民站在了犹太人这一边。1933 年 5 月 13 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人)针对纳粹分子的反人类暴行,向上海的德国领事馆提出了强烈抗议。宋庆龄发表声明说:“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经被逮捕……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他们的情况证明了目前遍布德国的野蛮行为……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杀……至于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励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天天都发现尸体,都是被残害得不可辨认的。”[3]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认为,纳粹主义的暴行有违人道主义理念,进而毅然决然地向奥地利的犹太难民伸出援助之手,向他们发放签证,帮助他们离开纳粹的魔爪,因此他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当时的国民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对犹太难民的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对纳粹分子的暴行进行了强烈的控诉。

(二)上海容纳难民的人数有限

自何凤山向奥地利犹太难民发放签证以来,逃往上海的犹太难民不断增加。1939 年 1 月起,犹太难民以平均每周 1 000 人的规模逃往上海。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1933 年至 1941 年间上海所接受的犹太难民数量最多的时候将近 3 万人。1941 年底仍有 2.5 万人留在上海,这远比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和南非五国接收的犹太难民的人数多得多。[4]

上海的犹太难民依靠犹太人协会以及其他慈善援助组织的帮助而勉强度日,其生活较为艰难。许多人主要住在棚子里,仅依靠汤肴厨房(soup kitchens)维持生活。犹太难民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涌入上海,无疑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治安产生负面影响。上海租界的百姓表示,自己的生活因为犹太难民的到来而受到了严重干扰,日常生活与管理也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5]309 上海的一些犹太社团和慈善组织,除了为犹太难民提供住房、食物、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外,还要帮助他们在当地寻找工作。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他们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Assistance of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主席斯皮尔曼(M. Speelman)在 1939 年 4 月 23 日的报告上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似乎无可救药[6]”。而上海的救济组织一筹莫展,上海的犹太居民由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一定的影响,也和他们的非犹太邻居一样,产生了忧虑和不满。[7]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939 年上海租界

的一些国家代表团体专门探讨了上海的犹太难民问题,最终决定限制难民继续入境。

当上海难以继续接纳更多的犹太难民的时候,中国人民中的一些进步人士已经在思考能否以及如何安顿源源不断到来的犹太难民。

(三)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有利于国民政府

为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积极奔走的德国犹太银行家雅克布·保格拉斯(Jacob Berglas)向国民政府表示,来华避难的犹太人每个人将携带 50~100 英镑,国民政府可以从中免费获得一笔数量可观的外汇收入。犹太人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各领域也有一技之长。如果犹太难民安置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国民政府也可以争取到相关领域的人才,以建设中国后方。[8]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生前曾对犹太民族表达过同情。他在给《以色列传讯报》主编、上海锡安主义组织主席伊斯拉的信函中说:"余愿就这项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向阁下伸致同情之忱,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重建你们伟大而历史上著名的国家,必然会给予全心的支持与热烈的欢迎。这一国家,在世界文明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也应该在国籍[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①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理应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加之中国自古就有人道主义救援精神。因此,国民政府认为制订和实施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是理所应当的。另外,国民政府也考虑到帮助犹太难民还可以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有助于中国获得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好感。

综合考虑之下,实施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是有利于国民政府的。

二、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拟定

我国的人口大都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人口相对较少,且气候适宜人类生存,又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的建设,更是方便了云南的交通往来。1939 年 2 月 17 日,孙科在一次常务会议上提出在西南边区划定一个区域作为犹太难民寄居区的提议。孙科的这项提议得到了国民政府一些高级官员的重视,随后不久便召开会议拟订了"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基本内容,决定将云南腾越(今腾冲)和蒙自之间的土地划作寄居区,并把无国籍的犹太难民②作为援助的对象。会议还规定犹太难民入境后,政府应该协助介绍相关工作,但难民不可进行政治活动,不得反对三民主义;犹太难民也可以按照法律程序办理入中国籍的手续,和一般国民享受同等的权利。[9]1939 年 5 月,响应该项计划的犹太难民已经有 1.4 万人滞留在上海。

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中央政府正打算在西南划出一块犹太难民的寄居区之后,曾经向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致了一封电文,在电文中表示:就云南而言,云南面积广大,但是人口较为稀少,尤其是思茅和普洱一带。这些地方土地肥沃,所以可以在那里安置犹太难民,开垦云南的良田。[10]

1939 年 7 月 21 日,行政院规定无国籍的犹太难民可以享受特殊待遇,而有国籍的犹太难民的待遇则和其他外国人一样,并规定来华避难的犹太难民,都应该住在通商口岸。行政院在同年 8 月 1 日(第 424 次会议)又规定,每个犹太难民应该携带 200 英镑作为居住和生活等方面的基本开销。[10]

1939 年 7 月 14 日,上海犹太人创办的《以色列传讯报》(Israel's Messenger)首次刊登了相关报道。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士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也报道了国民政府的这项计划。③

①伊拉斯英文原文为 N. E. B. Erre,收信地址为 29,rue Moliere(即莫利哀路 29 号,今香山路 7 号)。"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指"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参阅孙中山:《致伊斯拉函》(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5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56-257 页。

②国联救济机关或其他著名慈善团体能够证明犹太难民品德端正又没有国籍,即可视为"无国籍的犹太难民"。

③《以色列传讯报》在 1939 年 7 月 14 日第 14-15 页,8 月 16 日第 1、9、14、16-17、21 页,10 月 13 日第 16 页报道了此事。美国《密勒士评论报》刊载的《10 万犹太人可能在中国找到家,云南会成为难民的应许之乡,德国银行家令人鼓舞的动议》(One hundred thousand Jews may find home in China, Yunnan to be "Promised Land" of Refugees, German Banker Inspires Move)等文章,也报道了此事。"One hundred thousand"翻译为中文是"十万",而房建昌在《近现代外国驻滇领事馆始末及其他》中表述为"100"万,笔者疑为字误,故本文按照原文翻译。详见房建昌:《近现代外国驻滇领事馆始末及其他》,思想战线,2003 年第 1 期,第 114 页。

这些报道令上海的犹太难民欢欣鼓舞。雅克布·保格拉斯为此在上海华懋饭店(Cathy Hotel,今和平饭店)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并亲自前往云南进行实地考察,受到了云南省财政主管缪云台的接见。经过一番仔细地考察,雅克布·保格拉斯认为云南是犹太难民的“应允之乡”,其能够接纳犹太难民至少 10 万人,并拟订了“移植中欧犹太人来华之计划”。上海犹太组织还派人去重庆游说高层官员,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实施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11]

三、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的搁置

(一)国民政府高层难以形成稳定而坚定的共识

虽然国民政府高层就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国民政府内政部认为,应该在云南腾越商埠划定寄居区,以警察机关为基干进行管理,而且政府应该为犹太难民修建住宅。

外交部认为犹太人善于经商,恐怕不利于国家的商业管理;为了防止犹太人日后发生要求民族自决或自治的情况,应该只允许没有国籍的难民寄居到指定区域;有国籍的难民则应居住在通商口岸,否则会留下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而且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一事,在国际上宜侧重于宣传人道主义救济方面。

军政部则不愿意为犹太难民提供寄居区,认为无国籍的犹太难民才可以滞留中国,但是还不能授予居住权。

财政部反对将接近国际路线的地方划作寄居区,反对让犹太难民享有垦地所有权;而犹太难民的国籍问题,则应提交外交部办理。

交通部认为应该和犹太团体就居住区地点和生活设施等问题进行商谈,然后再做决定。[9]

行政院把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传达给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根据上述已知,龙云建议犹太难民来开垦云南的荒地,以便地尽其用,不至于荒废。蒋介石虽然不反对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但也并不热心。当孙科亲自到黄山别墅请教蒋介石的意见时,蒋介石表示自己眼下最关心的是国内战局。[12]

可见,国民政府高层对这一项计划虽然有心,但是各部门的具体意见并不完全统一,而且还存在着矛盾。蒋介石更多的是关注国内的抗战形势,而龙云的意见则和国民政府高层的意见不大相同。关于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国民政府高层没有形成稳定而坚定的共识,这就妨碍了计划的实施。

(二)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缺乏启动资金

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缺乏启动资金也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中国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贫困落后状态中走出来,民国初期的金融市场非常复杂而紊乱,国民经济已经发生困难。[13]302-304 加之碰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军费开支逐年攀升,最高时达到 87%;战争开支腾腾上涨,而战况却节节败退:到 1938 年底时,国内有 92% 的工业生产区已经落入日军之手,税收来源减少了 76%,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上升到 70% ~80%,[14] 国民经济体系日益走向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国民经济形势下,国民政府显然难以正常启动犹太难民安置计划。

犹太人在欧洲虽然有不少的财产,但是自从受到纳粹分子的迫害和驱逐后,大部分财产都已经被侵占了。他们被迫逃离欧洲时,路上只被允许携带 10 旧德国马克的现金,到达上海后,手里已经没有多少金钱,可谓是身无分文、穷困潦倒。[5]304 其中一个叫 W.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的犹太难民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在 1938 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将一无所有地离开,身无分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前景。”[5]299 欧洲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后,只有极少数在上海有亲朋好友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大多数人无所依靠,处境较为艰难。上海犹太社团、非犹太救援组织或慈善团体虽然也为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力量毕竟有限。上海的犹太难民虽然也获得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等地的慈善团体或知名人士的经费捐赠,但是要把 10 万犹太难民全部移居到云南并安顿好,经费还

是远远不够。①

（三）严峻的国内形势

鉴于当时的国内形势，云南省在当时虽然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管辖，但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割据性的地方政权，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方面都拥有很强的自主性。云南“所有的军事、行政、财政、人事，都与蒋介石中央保持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对蒋介石貌合神离，阳奉阴违，加上民主运动在昆明开展，使昆明有‘民主堡垒’的称号”[15]163。这些都让蒋介石甚感不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亦西迁重庆，云南、四川诸省成为国民政府的后方重地。中央力量一步步渗入地方，打破了地方势力独享一方的局势，中央和地方的摩擦和冲突便不可避免。蒋介石和龙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财经、军事、政治立场和对民主运动的态度四个方面。[16]198

在蒋、龙矛盾的前提下，关于犹太难民安置计划，重庆中央政府和云南省政府必然不会一拍即合。1938 年 5 月，龙云曾违背蒋介石倡导的“抗战到底”的信念，欲组成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联盟，发起和平运动。同年 6 月和 7 月，龙云又与四川军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联络，组成云南、四川、西康三省联合反蒋同盟。[16]172-173 12 月发生了“汪兆铭出走事件”②。这一事件在虽然在 1939 年 5 月得到暂时地平息，但是加深了重庆中央政府与龙云之间相互猜忌与隔阂的程度。在重庆和云南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再添加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明显就有节外生枝之嫌。龙云虽然口头上赞同这项计划，但并没有多少实际上的举动。蒋介石也并非像孙科和孔祥熙等人那样对这项计划有那么高的积极性。

1938 年以后，云南的外来人口在短时间内猛增。外地机关、学校、工场陆续迁来，美军及技术人员来滇的有 2 万多人。据统计，涌入滇境的军民不下 100 万人。这时，外米无从进入，内地运粮转运维艰。[15]138 人口的骤然增加，必然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加上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云南也面临着物价高涨和运粮困难等问题。1939 年 3 月 2 日，龙云在“龙云为各军补充兵宜驻黔训练电”的电文中表示：“滇省近来百物昂贵，米价陡涨，生活增高……地方食粮已极感困难。”[17] 如果此时数以十万计的犹太难民移居云南，无疑会给当地增加压力，使原本矛盾的局势更为复杂化。

另外，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形势也较为复杂。上海之所以成为犹太难民较为理想的避难地点之一，除了已经存在的犹太社团和拥有便捷的海外交通条件之外，还和当时多种政治力量并存有很大的关系。上海不仅仅是一座经济较为发达的国际化城市，更是一座被一系列不同政权包围和统治的城市。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拥有多种政治经济利益，租界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列强可以在自己的租界内行使自己的管辖权，上海也因此被称为“国中之国”。“由于对货物、金钱以及人员的国际性流动缺少法律限制，上海还成为世界上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大都市之一。因为进入上海不需要任何官方批准，所以这个城市成为 20 世纪冲突混乱的年代里难民的避难所。”[5]301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西南地区成为其后方重地。国民政府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存在矛盾：蒋介石坚持主张抗战，认为“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汪兆铭则主张与日本议和，他表示：“日本的困难是如何结束战争，而我国的困难是如何支持战争。”[18] 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还存在着

①雅克布·保格拉斯经过考察之后，估计安置 10 万难民所需的费用至少为 5000 万法币，有一半左右的经费没有着落，他还寄希望于云南省政府的贷款。参阅若雪：《1939 年：犹太难民移华始末》，湖北档案，2012 年第 1 期；约翰·阿哈勒斯（John Ahleps）在《中国星期论坛》（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认为，该项计划至少需要 3500 万美元，并认为它被实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参阅唐培吉等：《上海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 年。

②193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自重庆出走，道经昆明与龙云有一夕之谈，次日奔赴越南河内；次年转往上海、南京，与日本人接触，意图建立政权，此所谓“汪兆铭出走事件”。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昆明成为西南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交通枢纽，汪兆铭为了自己的安全以及保住与日本和议的成果，势必得争取龙云。这一事件使重庆与昆明之间互不信任的情绪更为严重。

利益之争。

在这样复杂的国内形势下,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根本不可能得到妥善地安排和实施。

(四)严峻的国外形势以及计划的搁置

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被搁置,也与德国和日本方面的因素有着重要的关系。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和德国的关系颇为密切,德国派来大批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培养人才,让年轻的中国军官赴德学习,并且中德之间在经济、政治、文教等方面的往来也很频繁。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是中国军火提供商中的大宗,1937 年运送到中国的战略物资价值为 8 278.86 万马克,包括各种武器和弹药。[13]454-456 因此,蒋介石对德国人颇有好感,希望德国能节制日本对华的军事行动。但是 1938 年以后,中德关系有了转变。1938 年德国发表声明承认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政府,德国的军火也被禁止输入中国。这说明随着中国战局的发展,德国看到了日本在远东战场的重要性。国民政府担心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会影响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甚至会导致德国帮助日本打击中国。考虑到这一点,国民政府对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不得不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甚至有些畏缩起来。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由于战争吃紧,在与日本的战争中连连失利,大片国土沦陷于日军手中,所以谈不上有多少精力来打理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1938 年开始,日本对重庆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空袭,造成无数平民死伤,也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紧张的神经。重庆政府准备疏散民众,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也建议将与军事无关的各个机关一律疏散,迁出重庆。[19]1939 年 4 月,云南昆明也遭到了日军敌机的空袭。龙云在 4 月 15 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称:“连日敌机侵入滇境,轰炸省会附近,元日敌机又轰炸蒙自”。[20]日本空军飞入云南境内,不仅使云南局势紧张,还造成了较为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①相比犹太难民安置问题,抗战的形势显然更为紧迫。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积极谋划“河豚鱼计划”(Fugu Plan)②,企图利用犹太难民为侵华战争服务,但是上海的犹太难民大都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日义举,并声讨日本的侵华行径。日本认识到难以实行“河豚鱼计划”,于是阻挠中国的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

在上述内外交困的严峻条件下,蒋介石终于表示妥协。蒋介石得知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Dr. Oskar P. Trautmann)来电抗议“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后,他便指示孙科、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暂时将计划搁置。[12]

1939 年 8 月 21 日,已占领上海的日本当局和上海一些国家代表宣布拒绝任何新的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这相当于关闭了犹太难民落脚中国的重要门户。后来,犹太人来华的海路和陆路也逐渐被意大利和德国所控制。犹太难民来华的人数锐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对于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云南犹太难民安置计划之所以被搁置,可以总结为四个原因:第一,国民政府高层内部难以形成稳定而坚定的统一意见;第二,计划的实施缺乏启动资金;第三,国内严峻的抗战形势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隔阂;第四,国际上德国和日本等方面的限制性因素。

在许多国家将犹太难民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基于上海难以容纳更多的犹太难民的现实需要,中国政府这项计划的提出,无疑给处于困境中的

①云南省档案局(馆)编辑的《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下)》对日本空袭给云南造成的伤亡、经济损失以及相关救济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参阅云南省档案局(馆)编:《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下)》,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年,第 601-621 页。

②“河豚鱼计划”是日本图谋在我国东北占领区建立犹太难民安置区的一项计划。日本打算凭借该计划利用犹太人的财力、影响力和人才为侵华战争服务,构建日本人心中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上海的犹太人民几乎全都反对日本对华发动战争。关于日本“河豚鱼计划”的提出、内容和评论等,可参阅(美)马文·托克耶、玛丽·斯沃茨:《河豚鱼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 年。

犹太人民带来了希望。然而,在严峻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困难重重,即使国民政府真的有心去做这样一项计划,也很难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资金顺利完成。虽然难逃被搁置的命运,但是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犹太人民深深的同情和援助之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深厚友谊的象征。

[参考文献]

[1]克劳斯·费舍尔. 德国反犹史[M]. 钱坤,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35.

[2]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29 - 1933[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7 - 21.

[3]宋庆龄. 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迫害[M]//宋庆龄. 为新中国奋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49 - 51.

[4]邵东林. 难民危机:全球关注的热点[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6.

[5]史蒂夫·霍克施塔特. 上海:犹太人的绝处逢生之地[M]//宋立宏. 从西奈到中国.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二)[J]. 民国档案,2000(1):36 - 48.

[7]戴维·克兰茨勒.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 - 1945[M]. 许步曾,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84.

[8]若雪. 1939 年:犹太难民移华始末[J]. 湖北档案,2012(1):47 - 48.

[9]佚名. 国民政府筹划犹太人寄居区档案选辑[J]. 档案与史学,2001(2):12 - 15.

[10]殷昭鲁,赵飞飞.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计划容留 10 万犹太难民始末[J]. 文史月刊,2007(2):54 - 56.

[11]房建昌. 近现代外国驻滇领事馆始末及其他[J]. 思想战线,2003(1):109 - 114.

[12]刘亦实. 在大西南安置犹太人计划的幕后[J]. 文史月刊,2002(10):56 - 59.

[13]吴相湘.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M]. 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14]张宪文,张玉法.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 11 卷 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65.

[15]谢本书. 龙云传[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16]杨维真. 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 - 1949)[M]. 台北:国史馆,2000.

[17]龙云. 龙云为各军补充兵宜驻黔训练电[A]//云南省档案馆. 云南档案史料丛编:滇军抗战密电集. 昆明:云南省档案馆,1995:238.

[18]古屋奎二. 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 11 册[M]. 全译本. "中央"日报社,译. 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191.

[1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王子壮日记:第 5 册[M]. 手稿本.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76.

[20]龙云. 龙云分析敌机连日侵入滇境轰炸用意致蒋介石电[G]//云南省档案馆. 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上).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146.